

Reports

FROM THE WEST

REPORTS FROM THE WEST

帝国的代价

【美】J·威廉·富布赖特

塞思·P·蒂尔曼 著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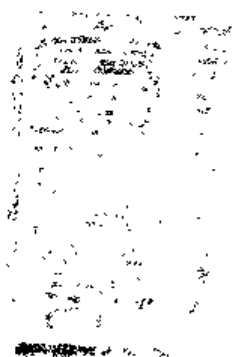


2 017 7034 2

-782

帝国的代价

〔美国〕 J. 威廉·富布赖特 著
塞思·P. 蒂尔曼
吴永和 袁明华 译
顾 速 校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8号

J. William Fulbright & Seth P. Tillman

THE PRICE OF EMPIRE

根据纽约Pantheon Books 1939年版本译出

CBY J. William Fulbright 1989,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本书中译本获富布赖特先生授权，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翻印必究。

帝国的代价

〔美国〕 J.威廉·富布赖特 塞思·P. 蒂尔曼 著
吴永和 袁明华 译 顾 远 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淮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30千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149—4

I·60

定价：3.80元

中文版序言

恰好44年前，根据新建立的富布赖特计划，第一批学者抵达美国东西海岸，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这第一批学者正来自中国。可以说，中国人是履行该项国际教育交流计划的先锋，其缘由是庚子赔款。20世纪初有2000名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为他们的奖学金奠定了历史的基础。然而，1年之后，即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富布赖特交流便突然中止，并且在许多年里一直没有得到恢复。错误信息和不信任，使中美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其富有就在于她有着最古老和最发达的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智能与自然资源。但这些丰富的资源需要依赖外部世界交换的酵母才能得到增长，并给她的人民带来繁荣。

美国是诸多国家中最幸运的一个——她的幸运在于有着富饶的国土，有着一个多世纪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开发这片土地，有着各色各样富有才智的人口。大体说来，美国不仅在国内生活方面，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都充分利用了这些天赐之物。在利用了如此之多、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美国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即无论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和之外，这个大国正处于失去前途的危险之中。

出现这种病变的原因虽然还不完全清楚，但它的再现却是历史的规律之一：力量倾向于把自己和美德源同起来，而一个大国特别敏感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它的力量是上帝对它偏爱的一种象征，是上帝授予它对别的国家的特殊责任——使它们变得比较富裕、幸福和明智，并按其自身闪光的形象

去重塑它们。力量不仅倾向于把自己混同于美德，而且还往往把自己当作是全能的。一旦充满了这种使命感，一个大国就很容易假定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也有办法从事上帝的所作所为。然而，上帝毕竟没有选择你充当他的代理人，他也不会允许你用武力去实现他的意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士兵系的腰带上就印着这样几个字：“上帝与我们同在”。正是在近乎这样一种狂热——一种夸大的权能感和想象的使命感——的驱使下，雅典人才进攻了叙拉古*；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才侵入了俄国。说明白一点，他们承担得太多，因而自食苦果。

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世界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展望政治前景，我有理由感到乐观。尽管我不赞成在波斯湾诉诸武力，但我们在不借助于核战争的情况下已经解决了中东危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虽然还没有在互相赞赏之中彼此拥抱，但仍继续坐在谈判桌上，显然在寻求可达成协议方面。柏林墙已经撤除。东西德人正艰难地试图依据西德的政府体制达成统一。前苏联人现在也遭受着现实的饥饿、失业和混乱等较大的苦难。虽然存在着这些严重问题，我却感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即在地球上实现真正的和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制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去征服人类真正的敌人：饥荒、疾病和贫困。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征战中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参加者。

J.W 富布赖特

1992年1月

* 叙拉古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译者注

译 序

曾有“美国之父”殊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200多年前指出：“我的政治学是简单而明白的。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建立它认为能使自己生活得最幸福的政府形式；只要它不侵犯别国的任何权利，对别国没有危险，任何政府都不应干涉另一政府的内政。”^①同时他还说：“人权，其中包括选举代表的权利，是一种最神圣的财产。谁企图利用钱财或倚仗权势去剥夺或攫取他人的财产或权利，谁就是把财产当作武器来利用，理应予以没收。权利的不平等，是由于社会一部分人勾结起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造成的。”^②很显然，上面的议论既表达了美国早期政治领袖对当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世界霸权政治的鄙夷，同时也反映了年轻的美国及它的人民对正义、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憧憬。

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幽默地背弃了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们的初衷。众所周知，经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利用战争获得的巨大财富，俨然以世界家长的态度动辄指手划脚；

①②《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第29、45页。

在其国内事务上，则呈现出金钱凌驾于政治、资本主宰一切的趋向。对于美国的这种嬗变，一些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深感痛心疾首。《帝国的代价》一书便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J.威廉·富布赖特先生——在其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抨击当今美国时政的一部力著。

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对美国政治体制、经济运行、外交策略等方面的批评，尽管不乏击中时弊的激烈鞭笞之词，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主要是凝滞于对“帝国”付出如此高昂代价却未能维持其鼎盛地位的责难，而对于造成这种态势的深层的客观必然性则有忽略之嫌疑。不难设想，倘若从客观必然性的视角解剖美国的社会制度，便势必会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而这无疑将超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思维范围。因此，在本书译稿完成之际，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全面客观地认识美国，同时也是为了理清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模糊认识，在此，就“帝国”何以必然付出如此代价、何以呈现出从顶峰跌落的征兆等与本书密切相关的问题，从政治学的层面给予扼要的分析。

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代美国的主体力量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已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美国政治舞台和经济领域的主要角色。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当代美国的股票所有权已呈现出分散的态势，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股票，这些股票持有者形成了一个占美国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不仅如此，美国的绝大多数公司企业的最高行政人员是由中产阶级出身的专家担任的，甚至在政府的要害部门也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来自中产阶级的优秀人才。然而，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及论据仅涉及了美国社会的皮象，而对其实质性的问题则

缺乏深刻的认识。

我们知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出现，尤其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它必然在资本集中的同时也孕育了中产阶级。这是因为，金融资本的形成和银行作用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具体来说，为了适应金融资本控制经济生活的需要，银行的职能开始由单纯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发展为以购买或交换企业股票业务为主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势必使股票所有权趋于分散（这里并不排除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因素）。美国的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中产生的。当然，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动摇（更谈不上取代）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霸主地位。

在当代的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人数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左右的、相互利用并互通婚姻的权贵集团。这个集团从财富数量上看，最上面的0.5%消费单位——家庭或单身个人——通过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拥有着全美国财富的25.8%，最上面的1%消费单位拥有全美国财富的34%^①；从对经济的影响看，这个集团的任何成员可以在他们选中的任何地方和时间投资，他们一声令下便可扩展、关闭或搬迁他们的工厂，他们可以随意地雇用、擢升或开除雇员；从对政治权力的干预上看，如果当选的官员不能迎合这个集团的需要，他们便会人为地制造经济困难，从而导致公众期望更换新的官员。此外，这个权贵集团在经济上的统治，

①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1985年）。

主要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所谓参与制，即凭借一定数量的股票对股份公司或企业实行统治的制度。那些持有小额股票的中产阶级成员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干预公司或企业的业务的，而权贵寡头一般只要掌握20%，甚至5%—10%的股票，就可以取得公司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在美国作为主体力量的经济前提是不存在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有相当数量身处公司或政府要职、地位在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行政管理人员已经或正在为权贵阶级所同化。他们在行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趋同于而不是背离权贵阶级。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出身的管理者为权贵阶级或集团所同化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权贵阶级所赐予的股票买卖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便可以使手中的股票值迅速增大。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500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中，个人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股票的占30%，拥有50万美元以上股票的占45%^①。其二是权贵阶级为其所设置的环境。具体来说，那些身居要职的管理人员只有对主人表示忠诚，并将主人的利润占有额视为自身最先考虑的东西，才能维持自己的切身利益。正因为如此，真正的中产阶级是绝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主宰力量的，对于这一点就连美国总统都看得很清楚：“成千上万想充分利用美国制度，发挥主动，获得好处的小业主、小商人，在这个特权阶层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并不比工人农民更自由。”^②

① 宁玉山等编：《政治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26页。

② D·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6页。

在对美国的经济主宰者有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让我们再从政治座标上来分析美国的政治权力主体。通过分析，读者或许将获得有关美国——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民主”实质的新认识。

对于“权力”的定义，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通常情况下，权力与政治权力又是一个对等的概念。现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权力定义，当推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表述：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若干人在被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某种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笔者认为，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基本范畴之一的“权力”，乃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约束或制抑现象的抽象概括。一般说来，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度量权力的标志有两个：①谁受益；②谁管理；在美国这个国会代议制的国家中还要加上第三个标志，即谁获胜。

首先来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究竟是谁受益。我们说，在一个社会或国家里，总有一种得到高度评价的事物，而这种事物又总是该社会或国家的每个成员都想尽可能地分享和占有的。于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这种东西的分配便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力的标志。换句话说，在政治学意义上，这种已经享有或占有绝大部分为社会高度评价的东西的人或阶级必然就是控制政治权力的主体。在美国，财富和金钱所得到的社会评价是最高的。对于这一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坚信不疑的。然而，财富在美国社会中绝不是平均分配的东西。就像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在美国，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只是为人数很少的权贵阶级所占有，而这种占有本身又意味着他们将在社会生活中最先和最易受益。这种对财富的不平

等占有的现实，无疑是美国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必然产物。美国的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让我们不要把权力解释为作决定的人，而解释为从制度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人。那些得到最大份额商品、服务和机会的人就是最有权力的人。”

接下来讨论谁管理。管理——作为权力的标志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人们常常很自然地从谁在公共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或可以做出重要决策等事实中，推论出谁最有权力。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一个集团或阶级在政府中的任职人数大大高于或大大低于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人们也可据此推断出该集团或阶级究竟是处于有权状态或是无权状态。当代美国政治学家菲利普·伯奇的研究提供了这样的数据：从1789年乔治·华盛顿政府至1980年吉米·卡特政府的每一届内阁官员、外交官员和最高法官，绝大多数为“经济界名流”。其中从1789年至1861年，经济界名流在政府中所占的人数比例是96%，1861年至1933年是84%，1933年至1980年是64%。需要说明的是，人数比例的下降是由于统计者排除了中产阶级出身的官员，如果把被同化的中产阶级官员考虑进来的话，其比例仍在90%以上。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在美国，是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控制着政府，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欺人和自欺的宣传罢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公民选举中究竟是谁获胜。人们都清楚，由于在利益、信仰、观点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决定了不同的阶级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中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通过投票的方式使得政府在税收、福利、环境等方面制定出他们所期望的政策。但是，仅凭此现象是不能断言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美国选举活动中的获胜者的，因为美国政府制

定政策的现实告诉我们，其政策确定的过程，有很多细节情况总是私而不宣的，而有些情况则往往被夸大或缩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护权贵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那么，再好的政治领袖也将被权贵阶级的“小动作”弄得丢掉职位。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美国社会中，权力的主体非大资产阶级的权贵莫属。而对于这一点，《帝国的代价》一书的作者却是讳莫如深的，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所在，其诸多弊端及失误的原因基本上都可以从这个要害处找到契机。在这里，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看权贵阶级是怎样控制和影响美国的政治权力的。

第一种策略是，权贵阶级利用金钱的魔力挑选满意的代理人进入联邦政府。在美国，大资产阶级介入挑选政府候选人过程的手法极其简单、露骨，这就是向候选人提供巨额的竞选经费。对于这一点，《帝国的代价》一书的作者也感到它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不尽人意之处。除直接提供竞选经费的露骨做法外，权贵阶级还有其他许多“含蓄”的方法，“迂回贿赂”便是最常用的一种。如1956年安德逊竞选副总统前夕，几家大石油公司之间围绕着安德逊进行了一笔复杂的交易。交易是以安德逊支付一美元“买”下某矿区的股权开始，几个星期后，又以90万美元之巨的价格“卖”出这一股权而告结束。虽然他最后没有当选副总统，但毕竟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至于那几家石油公司的大亨们将从安德逊那里获得多少油水和照顾，那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第二种策略是，以“资助”政策智囊来支配政府的决策。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联邦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大财团的董事会办公桌上提出的，政府仅仅是最后加以表

决并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这一过程的秘密就在于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系统主要是由政策研究团体、基金会、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所等构成。在这些貌似公正的组织机构中，至少有70%的成员是来自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董事。1953——1977年掌握美国政府重要部门国防部、财政部的21名成员中，17人是大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其余4人也和大财团关系密切；基金会在美国虽然成千上万，但有资格支配政府制定政策计划的则只有象洛克菲勒、福特等极少数权贵财团支持的基金会；至于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所，如著名的兰德公司等，往往都是依靠大亨的赠款才得以维持，其中半数以上的研究员被聘为大公司的董事而参与红利的分配。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政策不过是大资产阶级敲击手中的金钱而发出的回声罢了。

第三种策略就是通过操纵舆论工具来间接地行使权力。我们知道，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舆论对公众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倾向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毫无疑问，大资产阶级也同样具备这一生活常识。以美国莫尔比石油公司为例，它在20世纪70年代，每年都捐赠1.4亿美元给舆论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机构能不积极地做出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宣传吗？当前，在我们社会中不少人认为，美国的言论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是非常糊涂的看法。稍为有些头脑的人都会发现，在美国的公开言论中，揭露或抨击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政治家错误的言论是司空见惯的，但批评美国国家制度或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言论则极为罕见。本书对时政有所保留的批评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这事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了言论的发表和传播必须克守一定的限度。同时，资产阶级金钱的影响更是始终地维护着这一限度。所

以，那种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命运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达到的顶峰辉煌，及其接踵而至的失势跌落，尽管其中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如《帝国的代价》一书所详尽论述的，但归根结蒂，这一嬗变的过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帝国的代价》一书在美国出版后就立即引起轰动，这不仅是因为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及精辟的分析揭露出美国已呈现出来的种种可怕衰象，而且在于此书竟然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政坛享有盛誉的资深国会议员之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政界老人的伤感情绪，即对一种一去不复返的辉煌时刻的追忆和对已经萌生出端倪的黯淡前景的忧虑。因此，对于我们社会中那些至今仍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来说，这本出自对美国时政有切肤之感的资深政治家手笔的书，或许能提供一些令他们清醒的清凉剂。

当富布赖特先生闻知本书将出版中文译本，特撰写了中译本序言，并授权译者在中国独家翻译出版本书的中文译本。在此，我们向富布赖特先生表示真诚的谢意。

为了使中国读者较为便捷地把握书中的思想，在尽可能契合每章核心的前提下，我们重新设计了本书各章的标题，在此特作说明。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译文的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吴永和 袁明华

1991年6月

前 言

我想，在人们的记忆中，我是一个爱唱反调的人。其实，不是我存心要做这样一种人，只是当一些重要问题与你的最高愿望和最坚定的信念相违背时，除了反对或弃权外，别无选择。

唱反调不是我的生活准则。在我看来，一个参议员有对事情进行独立判断的责任，而不是纯粹作对。早在1965年，也就是我对约翰逊政府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策提出批评以及随之而来的辩论之后，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我力图对我所认为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作用进行界定，我说：“主席有特殊的义务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提供最好的建议；我相信，这是主席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义务，它优先于对党派的忠诚，也与主席的观点是否符合行政部门的要求或愿望无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观点很少符合行政部门的要求，甚至更不常符合它们的愿望。但不管是好是坏，我总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我是否做出了具有持久价值的任何事情，那就留待别人去评判。回顾我从二次大战到70年代中期这么多年的公共服务生涯，自认为还有一些值得褒奖的创举，如，成立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此计划迄今为止已进行了42个年头；以联合国的形式恢复国际联盟的工作（我认为自己对

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创办肯尼迪中心。然而，在追溯往事时，看起来明显的是，我有时期盼的比实际可实现的要多，我被越南战争，被反对修改分权原则及其总统选举程序等事件弄得心灰意冷。正像倾毕生精力于自由和独立却没有获得明确成效的拉丁美洲早期政治活动家米兰达那样，我有时也产生在这些领域里如同“在大海中耕耘”一样的感觉。

不过，我仍不怎么后悔，因为权力的悖论在于，可以实现而又真正值得实现的东西在政治中相对少得可怜。对于兴修水利、重建城镇、资助农场等项目，我也像其他官员一样，表示支持和鼓励，决不贬抑。我也乐意为棉花、鸡禽、大豆、稻米等给我的家乡阿肯色州人民带来繁荣的地方工业而尽职尽责。这些国内项目，都是多少容易实现的，它们使许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因而非常值得推动。可是，这些毕竟没有涉及到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核时代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面对20世纪后期的情形与挑战，我们国家的统治方式和统治适度的问题；安全、经济、教育和社会公平等国家需求的优先问题；像别人一样观察世界，以及为迎接全球性的挑战而朝着永久国际合作的目标前进的问题。

这些都可称作“生存”问题。要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就总会遇到一些障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目光短浅以及想象力的贫乏、共有的贪婪心理和政治野心、社会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在过时的“现实主义”名词的掩饰下，那些为结束劳民伤财的军备竞赛，为理性地重新思考我们的政府体制——尤其选举总统的程序，为切实采取措施实现联合国未兑现的诺言而制定的计划，往往在蔑视和嘲笑声中被取消了。现在，一些形容词也在变化着，从“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的”变成了“轻信的”、“天真的”和“反美的”。甚

至从拉丁文“自由”一词派生出来的“自由的”一词，在最近的竞选中，竟然也成了个耻辱性用语，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尽量回避它，唯恐自己被人看作是一个家家都信奉的偶像的亵渎者，一个和人人心中的古老神话相左的人，一个在当今日常生活和传统中都能找到的和平的破坏者，一个古老真理——它们即使过去曾经是，可现在已不再是真理——的挑战者。每当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试图不去经常思考它们），我就想起一位瑞典人在教导他的儿子时说的一句话。那是在百年战争*使欧洲惨遭蹂躏之后，这位瑞典人对他的儿子说：“记住，我的儿子，统治世界几乎用不着智慧”。我还想起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评论：“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国家会像美国这样缺少独立的思想和真正讨论的自由。”

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可又令人失望。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那么，我们除了等待灭亡之外便无事可做了。然而，我明显感到，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我们人类的天性方面，不管人类天性怎么脆弱，它养育了人的理性和怜悯之心。我们很少吸取经验教训这一不证自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不吸取经验教训。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太阳底下就会有新的东西产生——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从长期的罗马和平到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在法治之下维护当代世界和平的伟大构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如果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构想成功的希望很小，那在希望很小与毫无希望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一线光明。

*指1337—1453年的英法战争——译者注